

在历史课本上，在普通百姓眼里，张宗昌是大军阀、狗肉将军、五毒将军，几乎一无是处，但撇开大军阀的外衣，以另一种眼光来审视历史上的一些细节，或许能发现日常生活中张宗昌作为普通人的一面，虽然这些掩盖不了他大军阀的本质。

张宗昌与京剧

◎ 苏全有

喜爱京剧，常办堂会

张宗昌与当时著名的京剧演员关系十分密切、融洽。1925年4月，北洋政府明令他任苏、鲁、皖、豫四省剿匪督办，继而又任命他为山东省军务善后督办，彼时恰逢其母六十大寿，张宗昌大宴宾客，祝寿三天。余叔岩、杨小楼、梅兰芳、尚小云、程砚秋、荀慧生等名伶，均应邀至徐州演唱堂会，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各行名角荟萃一堂，盛极一时。其后督鲁时期，张宗昌在督署里建有戏楼一处，也曾先后在济南、北京、掖县老家演唱堂会。九·一八事变后，他回归北京，仍不时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和西城石老娘胡同私邸以及奉天会馆(即今西单哈尔飞剧院)举办堂会演出，应邀演出的仍然是这些名伶。

堂会演出的戏，有的在外面剧院是无法听到的，例如余叔岩与梅兰芳同台演出《打鱼杀家》。在西城石老娘胡同私邸小戏台，

还曾演出《六五花洞》，饰潘金莲者除梅、尚、程、荀四大名旦外，还有筱翠花(于连泉)、王幼卿，名丑萧长华、慈瑞泉、曹二庚等也均参加演出。旦角是一流旦角，丑角是一流丑角，如此众多的一流名角在当时能同台演出，实属难能可贵。若非张宗昌倡议，并出资治办行头，恐难实现。

1927年春节期间，张宗昌曾在济南督办公署东大楼为其父庆寿唱堂戏。

正月十五日是其父正寿。寿堂设在珍珠泉前大厅，大厅内悬灯结彩，挂满了寿屏、寿幛，还陈列着许多金寿星、金麻姑上寿、金镶玉翠、珍珠玛瑙，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。到上午10点开始拜寿。张宗昌将父亲请到寿堂正中坐下，自己穿上将大礼服，在军乐声中进入寿堂，向父亲行三跪九叩大礼，来宾也依次拜寿，有的叩头，有的鞠躬。拜寿毕，中午举行盛大宴会，山珍海味应有尽有，宴后即到剧场看戏。白天剧目均由济南各剧院上演，故来宾看戏者甚少；晚上全是北京名伶演出，一直演到深夜两点多钟。这天晚场由少将副官李文征亲自把

门，凭请柬入场。台前的池座均设方桌铺台布，放有烟、茶、糖果、糕点等，就座的均是贵宾，如当时知名的前清遗老康有为，下台的大总统曹锟，号称大帅的吴佩孚，名为联帅的孙传芳等，他们都穿着长袍马褂，其中康有为身躯矮小，须眉皆白(康这次由济南回青岛不久，即于同年3月21日暴卒，葬于青岛李村南山)。

这天晚上，北京名伶演的是全本穆桂英，由四



大名旦(梅、尚、程、荀)轮换饰演穆桂英，梅兰芳演的是穆桂英挂帅一段。直到深夜全剧将演完时，只见由张宗昌陪着出去的曹锟又回来了，随着又加演一出《游龙戏凤》，余叔岩饰正德皇帝，梅兰芳饰李凤姐，珠联璧合，堪称佳绝。当剧演至中场时，忽然刹住锣鼓，出来“天官赐福”，为曹大总统“加官”，接着一个人高举现钞两千元(当时可购面粉1200袋、猪肉6250公斤)，高唱“谢曹大总统的赏”，同时余、梅二人并肩到台前深深一鞠躬，然后继续演唱起来。这时人们才知道是曹锟点的戏。这台祝寿戏到此也就结束了。

张宗昌后来最喜欢听的一出戏是《霸王别姬》。虞姬自然是由梅兰芳扮演，霸王则由杨小楼扮演。张宗昌后来之所以偏爱这出戏，可能是与他的切身经历密切相关。楚霸王项羽起兵江东，征战四方，盛极一时，然而最终被困垓下，陷入穷途末路，发出无可奈何的凄凉悲怆感慨。正是这种感慨唤起张宗昌在思想和感情上的共鸣。每当自家堂会演唱这出戏时，往往是先摆好酒席，正如戏里常说的“酒宴侍候”，锣鼓一响，他便如剧中人楚霸王一样，举杯畅饮，一边听戏，一边有姬妾把盏进酒。此时此刻，他或



许恍如剧中人，与之融成一体。

与京剧名伶关系融洽

张宗昌一向挥金如土，对这些名伶的精彩演出自然要重金酬报。不仅如此，而且敬如上宾，礼貌周到。在徐州演唱堂会时，除赠酬金外，还赠送烟土，五十两一包，根据角色等级不同，数量也有所不同，最多者十五包，依次有十二包、十包、八包，等等。

这些名伶是很讲义气的。张宗昌下台以后，特别是闲居在北京时，无钱又无势，还要唱堂会。这些名角依然如故，召之即来，不仅如此，往往还随便派戏，从未同台演出的，一经提出，就能合作演出，余叔岩与梅兰芳合作演出《打渔杀家》，便是突出的例子。张宗昌的参谋长李藻麟在这方面深有体会，因为那时唱堂会，李经常担任安排剧目的任务，有时考虑不周，名伶们还主动想办法出主意，为李补台。

有一次，李藻麟想提携年轻演员李万春，就派了一出戏，由余叔岩与李万春合演《八大锤》，事前疏忽，没有征求余叔岩的意见，事中脱口而出。由于辈份与水平的差异，余叔岩面有难色，杨小楼在一旁看出问题，便主动向李提出：“还是由我和叔岩合作演出，您看好不好？”李藻麟立刻恍然大悟，并向余表示歉意。这些堪称泰斗的演员能如此屈己从人，实属难能可贵，若不是看在张宗昌的份上，万难办到。

余叔岩就曾对李藻麟说过：“当初，人家（指张宗昌）有钱时，我们花过人家的，现在不能因为人家没钱了，就不侍候了！”余也曾当面对张宗昌说过：“您什么时候想听，您自管说话，我随时随到。”

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，余叔岩每次堂会演出，不仅自己分文不取，而且连场面也由他自理。梅兰芳自己也是分文不取，只要“脑门钱”八十元，用以支付琴师、鼓师等伴奏人员的费用。

举办堂会，为每位名演员确定演出酬金数额，是一个颇感棘手的问题，因为它涉及到对每位演员的评价及其在梨园界的声望和地位等。处理得当，皆大欢喜；处理不当，就会产生意见。因此，张宗昌请余叔岩全权处理，由余提出名单，规定酬金数额，令有关人员照此支付。最高者，一次可得一万元。

大军阀的另一面

张宗昌对京剧的喜爱，对我国京剧史产



生了巨大影响，“四大名旦”这一称谓的出台，就与之有关。在1925年左右，梅、尚、程、荀四人在张宗昌府中演出堂会戏《四五花洞》，因四人旗鼓相当，难分轩輊，故而有“四大名旦”一说。其中，梅兰芳独占旦首。梅也当之无愧，如果男性之间也有一个人可以被称做“天生尤物”的话，这个人应该就是梅兰芳！后来，徐碧云、朱琴心等欲与“四大名旦”一争高低，均未能实现，只有花旦名家于连泉（艺名筱翠花）因其技艺精湛，一出《乌龙院》就能与“四大名旦”分庭抗礼，在观众中的影响也可与梅、尚、程、荀平分秋色，所以在京剧界始终与“四大名旦”平起平坐。至于所谓的“五大名伶”，是1927年北京的大商号瑞蚨祥为捧当时的名旦徐碧云，于6月20日在《盛天时报》第五版刊登“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”的启示所“草拟”的。一月后，刊出选举结果是梅兰芳、尚小云、荀慧生、程砚秋、徐碧云各有一剧当选。但这种舆论操作，在京剧史上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。

“四大名旦”之中，程砚秋后曾提到他对张宗昌的不满：程师自济返京不久，我（程的学生刘迎秋）即向他提出拜师之请。他说：“你的家庭很好，本身又是大学生，为什么要干这一行呢？你看我的小孩，一个学戏的也没有，社会上都歧视这行人，叫‘戏子’、‘淫伶’。使我受刺激最深的是，在军阀混战时期，我到山东演戏，一天，军阀张宗昌听完戏后，不叫我卸妆去陪他喝酒。我听了非常气愤，这不是污辱人吗？我当时说，这不合适吧，便卸妆而去。从此，我下

定决心，不让子女唱戏。”从此事可以看出，一方面张宗昌处事确有不当之处，另一方面，张对京剧名角拂袖而去还是比较宽容的。

张宗昌的宽容大度，在对其他名人那里也可以得到印证。某年夏天，张宗昌因病延范文甫诊视。范氏襟怀坦荡，不拘小节，有古侠士之风，时人称之“范大糊”，范氏不以为忤，乐于受之，且自号“古狂生”。诗稿中有“风波万丈寻常事，兀立横流莽丈夫”之句，足见其秉性耿直，不畏权势之品格。范氏诊断病情后，挥笔书清震汤一方（升麻、苍术、荷叶3味）。张接阅后，嫌药味太少，颇为不悦，出言不逊。范闻后直言讥笑：“用药如用兵，将在谋而不在勇，兵贵精而不在多，乌合之众，虽多何用？治病亦然，贵在辨证明，用药精耳！”四座皆惊，范则旁若无人，谈笑自如。名医范文甫恃才傲物之风范昭然，张宗昌的大度亦显而易见。

张宗昌简介

张宗昌（1881—1932），字效坤，山东人。早年在东北当土匪，辛亥革命时率百余兵马回到山东任民军的团长；不久投进北洋大军阀冯国璋的怀抱，由于派人刺杀革命党人陈其美有“功”而当上副总统侍从武官长；后又转换门庭投靠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，升任军长。1925年以“军务督办”的名义盘踞山东，其间曾残酷镇压青岛的工人运动；1928年被赶下台，后被军阀韩复榘派人刺死。■